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

BIBLIOTHEQUE DE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Jean-François Lyotard*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 后现代状态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车槿山译

*Jean-François Lyotard*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利奥塔尔  
(Lyotard, J. F.)著;车槿山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1997. 1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095-X

I. 后… II. ①利… ②车… III. 知识-研究 IV. 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5575 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作 者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译 者 车槿山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荻 孟华(以姓氏笔划排列)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875  
字 数 79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7.80 元

##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与情感——犹如凭藉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原文艰涩，多经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译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

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味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藉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 引 言

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这个词正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的笔下流行，它指的是经历了各种变化的文化处境，这些变化从 19 世纪末就开始影响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游戏规则了。在这里，我们将通过与叙事危机的比较来定位这些变化。

科学在起源时便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为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学不想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只要它还寻求真理，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作哲学。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大叙事时，我

们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例如,在理性精神可能形成一致意见这种观点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一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我们可以通过此例看出,用一个包含历史哲学的元叙事来使知识合法化,这将使我们对支配社会关系的体制是否具备有效性产生疑问:这些体制也需要使自身合法化。因此正义同真理一样,也在依靠大叙事。

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怀疑大概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但这种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与合法化元叙述机制的衰落相对应,思辨哲学和从属于思辨哲学的大学体制出现了危机。叙述功能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装置: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它分解为叙述性语言元素的云团,但其中也有指示性语言元素、规定性语言元素、描写性语言元素等,每个云团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语用学化合价。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许多语用学化合价的交叉路口。我们并不一定构成稳定的语言组合,而且我们构成的语言组合也并不一定具有可交流的性质。

因此,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

(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

然而,决策者力图采用一种输入输出模式。按照一种包含元素可通约性和整体确定性的逻辑来管理这些社会性云团。他们为了权力的增长而献出了我们的生活。不论在社会正义问题上,还是在科学真理问题上,权力的合法化都是优化系统性能,即优化效率。在我们的全部游戏中实施这一标准将带来某种或软或硬的恐怖:你们应该成为可操作的,成为可通约的,否则就消失吧。这种最佳性能逻辑大概在许多方面都不一致,尤其是造成了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它既希望劳动更少(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又希望劳动更多(以便减轻社会对无业人口的负担)。但从今以后怀疑变得如痴强烈,以至我们不能再像马克思一样指望这些矛盾中出现一条拯救之路。不过后现代状态与这种幻灭无关,也与非法化的盲目实证性无关。在元叙事之后,合法性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操作标准是技术性的,它不适宜用来判断真理和正义。合法性是否像哈贝马斯(J. Habermas)设想的那样存在于通过讨论而达成的共识中呢?这种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



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它的根据不在专家的同构中,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

这里展开的问题是:社会关系的合法化,公正的社会,是否可能依照一种类似科学活动的悖论来实现?这种悖论是什么?

下面的文章是应时之作。它是应魁北克省政府大学委员会主席的要求而提交给该委员会的关于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的报告。主席先生还友好地允许这份报告在法国发表: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但报告人是哲学家,不是技术专家。后者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而前者却不同。一个人是在总结,另一个人是在发问,这是两种语言游戏。它们在这里被混淆了,结果都进行得不好。

哲学家至少可以自我安慰地设想,在他之后,人们会对哲学和伦理政治学的某些合法化话语作出语用学形式分析,这种分析也是此报告的基础。他已经用多少带有社会学色彩的方法对此作了介绍,虽然篇幅短小,但确定了范围。

总之,我们将此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樊尚大学)哲学综合科技学院,在这个非常后现代的时刻,这所大学有可能消失,而这所学院则有可能诞生。

# 目 录

1	引 言
1	第一章 范围: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
11	第二章 问题:合法化
16	第三章 方法:语言游戏
22	第四章 社会关系的性质:现代的抉择
31	第五章 社会关系的性质:后现代视野
40	第六章 叙述知识的语用学
51	第七章 科学知识的语用学
59	第八章 叙述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67	第九章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80	第十章 非合法化
89	第十一章 研究与通过性能达到的合法化
103	第十二章 教学与通过性能达到的合法化
116	第十三章 研究不稳定性的后现代科学
130	第十四章 通过误构达到的合法化

## 第一章 范围：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

我们的工作假设是：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以及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知识改变了地位<sup>1</sup>。这种过渡最晚从 50 年代末就开始了，它对欧洲来说标志着重建的结束。各个国家的过渡有快有慢，各个活动部门的过渡也有快有慢；因此很难写出完整的编年史，很难画出总表<sup>2</sup>。一部分描述只可能是臆测的。但我们知道，过分信任未来学是不谨慎的<sup>3</sup>。

与其制定一张不可能完整的图表，我们不如从一个特征出发，它能立即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我们可以说，40 年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sup>4</sup>、交流问题与控制论<sup>5</sup>、现代代数与信息学<sup>6</sup>、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sup>7</sup>、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sup>8</sup>、存储问题与数据库<sup>9</sup>、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sup>10</sup>、悖论学<sup>11</sup>；以上是明显的证据，这还不是完整的清单。

这些科技变化似乎应该对知识产生巨大的影响。受到影响或即将受到影响的是知识的两个主要功能：研究与传递。关于第一个功能，遗传学提供了外行也能明白的一个例子：它的理论范式来自控制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关于第二个功能，我们知道，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化<sup>12</sup>。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文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sup>13</sup>。

在这种普遍的变化中，知识的性质不会依然如故。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sup>14</sup>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关于翻译器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sup>15</sup>。信息学霸权带来某种必然的逻辑，由此生出一整套规定，它们涉及的是那些被人当作“知识”而接受的陈述。<sup>16</sup>

从此我们可以见到明显的知识外在化，这是相对于“知者”而言的，不论他处在认识过程的哪一点上。以前

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具有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sup>16</sup>。

我们知道,在最近几十年中,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sup>17</sup>,这已经显著地改变了最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构成<sup>18</sup>,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最主要的薄弱环节。在后工业和后现代时期,科学将继续保持并且可能加强它在民族国家生产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由于这种形势,我们有理由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会不断增大<sup>19</sup>。

但这个方面不应该让人忘记与此互补的另一个方面。知识具有对生产能力而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它在世界权力竞争中已经是、并且将继续是一笔巨大的赌注,也许是最重要的赌注。因为民族国家曾经为了控制领土而开战。后来又为了控制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而开战。所以可以想象它们在将来会为了控制信息而开战。这样就为工业和商业战略,为军事和政治战略开

拓了一个新的领域<sup>20</sup>。

不过，这里引出的观点并不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简单，因为知识的唯利化不可能不触动现代民族国家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面过去掌握、现在仍然掌握的特权。知识从属于社会的“头脑”或“精神”，即从属于国家，这种思想将随着与此相反的另一原则的巩固而过时；按照这种相反的原则，只有当社会中流通的信息十分丰富而且易于解译时，社会才能生存并获得发展。一种“交流透明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商品化一同出现，对这种意识形态而言，国家开始成为不透明性和“噪音”的制造者。从这个角度看，经济机构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新的尖锐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那些被统称为多国企业的资本流通新形式。经济机构已经使国家机构的稳定性陷入危险境地。这些资本流通新形式意味着，有关投资的决定至少部分地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sup>21</sup>。随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为棘手。例如，假定一个类似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企业得到允许，占用一条地球轨道场来放置通讯卫星和/或数据卫星。谁将进入这些卫星？谁将规定禁止使用的波道或数据？是国家吗？或者国家只是许多用户中的一个？这样就出现了新的法律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带来了如下的问题：谁

将拥有知识？

因此，知识性质的改变将对执政当局产生一种反作用，迫使当局重新考虑自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与大企业、更一般地说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世界市场的重新开放、非常激烈的经济竞争的重新开始、美国资本主义排他性霸权的消失、社会主义的抉择、中国贸易市场的可能开放，这一切以及其它许多因素已经在这个 70 年代末出现，促使国家认真审查自己从 30 年代以来通常所起的作用，即保护与指导，甚至是计划投资”。在这一背景中，各种新科技只可能增强审查的紧迫性，因为它们使那些用于决策的数据（即控制手段）变得更流动，更容易被窃取。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不是根据自身的“构成”价值或政治（行政、外交、军事）重要性得到传播，而是被投入与货币相同的流通网络；关于知识的确切划分不再是“有知识”和“无知识”，而是像货币一样成为“用于支付的知识”和“用于投资的知识”，即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劳动力的恢复，“幸存”）而用于交换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优化程序性能而用于信贷的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透明性和自由主义是相同的。自由主义并不妨碍在金钱的洪流中，一些钱用来决策，而另一些钱只适合用来还债。我们同样可以想象知识的洪流通

过性质相同的渠道,但其中的一些知识是为“决策者”保留的,而另一些知识则用来偿还每人在社会关系方面不断欠下的债务。

原注:

- 1 图雷纳(A. Touraine):《后工业社会》,德诺埃尔出版社,1969年;贝尔(D.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纽约,1973年;哈桑(I. Hassan):《俄耳甫斯的解体——论后现代文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贝纳姆(M. Benamou)和卡拉梅洛(Ch. Caramello)编《后现代文化的表现》,威斯康星,20世纪研究中心出版社,1977年;柯勒(M. Köhler):《后现代主义——概念史的考察》,载《美国研究》第22期,1977年。
- 2 比托尔(M. Butor)发表过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它已成为经典:《运动物体——展现美国的习作》,伽利玛出版社,1962年。
- 3 福尔斯(J. Fowles)编《期货研究手册》,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78年。
- 4 特鲁别茨柯依(N. Troubetzkoy):《音位学原理》,收入《布拉格语言学学派作品集》第7卷,布拉格,1939年。
- 5 维纳(N. Wiener):《控制论与社会》,波士顿,霍顿·米弗林出版社,1949年;阿什比(W. Ashby):《控制论入门》,伦敦,查普曼-霍尔出版社,1956年。
- 6 参见诺伊曼(J. von Neumann, 1903-1957)的著作。
- 7 贝莱尔(S. Bellert):《控制论系统的形式化》,收入《当代科学中



- 的信息观念),子夜出版社,1965年。
- 8 穆南(G. Mounin):《翻译的理论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计算机革命始于1965年,那时出现了新一代的360I. B. M. 计算机,参见莫克(R. Moch)著《信息学的转折》,收入诺拉(P. Nora)和曼克(A. Minc)编《社会的信息化》(附录四《贡献性文件》),法国文献出版社,1978年;阿什贝:《第二代微电子技术》,载《研究》第2期,1970年6月,第127页以下。
  - 9 戈德费尔南(C. Gaudfernan)和塔伊布(A. Taib):《术语汇编》,收入《社会的信息化》;贝卡(R. Beca):《数据库》,收入《社会的信息化》(附录一《新信息学和新增长》)。
  - 10 儒瓦耶(L. Joyeux):《信息学先进技术》,收入《贡献性文件》。家庭终端将在1984年前商业化,价格约为1400美元,参见国际资源发展报告《家庭终端》,康涅狄格州国际资源发展出版社,1979年。
  - 11 瓦茨拉维克(P. Watzlawick)、赫尔米克-比文(J. Helmick - Beavin)和杰克逊(D. Jackson):《人类交流语用学——对相互影响的模式、病理及悖论的研究》,纽约,1967年。
  - 12 经济及科技系统分析展望小组的特雷伊(J. Treille)宣称:“我们没有多谈存储扩散的可能性;尤其是通过半导体和激光(……),不久每人都能在他需要的地方廉价地存储信息,而且还将拥有独立处理的能力”(《传媒周报》第16期,1979年2月15日)。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半数以上的中学生经常使用计算机,80年代初每个学校都将拥有一台计算机(《传媒周报》第13期,1979年1月25日)。